

石地
著

古代警句格言

本书将古代名言警句分类汇编成文。我国古诗文卷帙浩繁，如何引用其中名句，对博览群书、学有根基的读者来说，固可以信手拈来，出口成诵。但对多数古诗文爱好者和写作爱好者来说，却是欲引难寻，索之忘源，难于采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书名：古代警语格言

目录

第一章 经典名篇

幽梦影节选

吕氏乡约

琴堂谕俗编

老子选

庄子选

第二章 人间世

大宗师

应帝王

曾国藩日记节选

孔子教子学《诗》《礼》

王褒《幼训》

第三章 学治续说

呻吟语

幽梦影节选

二十日亲师儒

警语格言

正文

第一章 经典名篇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

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囚瘞、洞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

[元帝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后肃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将谋为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敦。敦败死也。]

[译文]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跋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假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敦兵败而死。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马玄博综艺术，以雄豪自处。晋安帝以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

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于乐推哉？]

[译文]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桓玄，字敬道，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像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奋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是他应得的下场。”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如此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贼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猷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议曰：贾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

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晏者也。乃孩抱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义、礼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乃生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女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女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从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

晋惠帝太子通有罪，阎纂上书谏曰：“臣伏念遇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君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欲令知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非但东宫。诸王师友、文学亦取豪族力能得者，岂有切磋，能相长益？今通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选师傅。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臣、以学行自立者，及涉履艰难、名行素立者，使与游处。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但道古今孝子事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由此观之，故太子者，选左右俾谕教之，最急也。]

[译文]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所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之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和下贱的，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良师益友的规劝听不到，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远离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法，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遁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通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

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通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该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侍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急切的问题了。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何也？[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第二子，受后魏禅也。]

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翻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秽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彥，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议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贤者而国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与人之谋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见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贼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但在用于不用耳。苟为不用，反贻君误贤，人君子安能救败乱乎？”]

[译文]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傲。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以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块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后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陈武帝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向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译文]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先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的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侑平？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

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迹，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殫，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猫鬼事起，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皆坐焉。]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也]。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爱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女，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

袁绍爱少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别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译文]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到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宣帝宇文赧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定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素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晋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汉高祖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汲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兔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己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亲生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仅是为了拿俸禄，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舵，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中实险彼，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译文]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级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予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译文]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扇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译文]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译文]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知道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辨；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是谓六邪。

[译文]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译文]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不大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译文] “有的官员表面上好像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什么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译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而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译文]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

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译文]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译文]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译文]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译文]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系，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译文] “有的官员一心一意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像他这种做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主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样的人。”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趣。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诘，道同委蛇，盖谓是也。”[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诛，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译文]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校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传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易于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诘’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得。”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像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得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计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反之，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蛆桅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议曰：此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帮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

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他敢和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己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及至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曄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英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时期，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非但不同情臧洪，反而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糊涂。在三国那个时代，正像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像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对此范曄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像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开战，根本没什么信义可讲，惟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那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据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

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怨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攻打下采，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用，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叫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他像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做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投奔曹操吧。”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而已哉？夫兼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迹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泽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已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躲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译文] 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能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他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个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他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此时，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一样和煦，春雨一样湿润，让普天下的人民像春草一样受到滋润。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两座城池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拔，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能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测风云呢？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城。如此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

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懂得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施者不知，受者不知，诚动于天之南，而心通于海之北，是谓神应。我意才萌，彼意即觉，不俟出言，可以默会，是谓念应。我以目授之，彼以目受之，人皆不知，两人独觉，是谓不言之应。我固强之，彼固拂之，阳异而阴同，是谓不应之应。明乎此者，可以谈兵矣。

[译文] 施与的不知道，接受的也不知道，诚恳表现于天之南而诚心通于海之北，这叫神应。我刚萌发一种意念，对方马上领悟，不等出言，已经默会，这叫念应。我用目光授意，他用目光接受，别人都未觉察，只有我二人独知，这叫不言之应。我固执地勉强他，他固执地反对，表面上意见不同，暗中却是相同的，这叫不应之应。明白这些道理的，就可以谈论用兵之道。

●卑幼有过，慎其所以责让之者：对众不责，愧悔不责，暮夜不责，正饮食不责，正欢庆不责，正悲忧不责，疾病不责。

[译文] 地位低、年纪小的人有过失，责备他们一定要慎重时机：当着众人面不责备，他已惭愧了不责备，黑夜不责备，正在吃饭时不责备，正在欢庆时不责备，正在悲伤时不责备，生病的时候不责备。

●举世之议论有五：求之天理而顺，即之人情而安，可揆圣贤，可质神明，而不必于天下所同，曰公论。情有所便，意有所拂，逞辩博以济其一偏之说，曰私论。心无私曲，气甚豪雄，不察事之虚实、势之难易、理之可否，执一隅之见，徇时俗之习，既不正大，又不精明，蝇哄蛙噪，通国成一家之说，而不可与圣贤平正通达之识，曰妄论。造伪投奸，谗樽诡秘，为不根之言，播众人之耳，千口成公，久传成实，卒使夷、由为跻、跖，曰诬论。称人之善，胸无秤尺，惑于小廉曲谨，感其煦意象恭，喜一激之义气，悦一霎之道言，不观大节，不较生平，不举全体，不要永终，而遽许之，曰无识之论。呜呼！议论之难也久矣，听之者可弗察与？

[译文] 举世的议论有五种：按天理来衡量符合天理，用人情来要求符合人情，可以让圣贤来度量，可以请神明来评定，而不必让天下的人都认同，这叫公论。所议论的事情对有些人有利，所讲的意见与有的人不合，旁征博引，以激烈的辩说来成就其偏向某一方的议论，这叫私论。心无私心，气甚豪雄，不观察事情的虚实、势的难易、理的可否，执一偏之见，拘泥于当时的习俗，既不正大，又不精明，如蝇哄蛙叫，使全国都变成了一种论调，但又不和圣贤平正通达的见识相合，这叫妄论。造伪投奸，痛恨毁谤，隐秘难测，造无根之言，捐众人之耳，千口传说，似成公论，长久传播，好像实事，从而使伯夷、许由这样的贤者被诬为庄佞、盗跖那样的恶人，这叫诬论。称赞人家的好处，但胸中没有标准，迷惑于小处的廉洁谨慎，感动于和乐的貌似恭敬，喜欢他一时激发的义气，悦服他一时合于道理的话，不观大节，不察其平生为人，不看全体，不要求永终，而马上称许，这叫无识之论。啊！议论之难是长久以来的事了，听的人可以不明察吗？

●简静沉默之人，发用出来不可当。故停蓄之水一决不可御也，蛰处之物其毒不可当也，潜伏之兽一猛不可禁也。轻泄骤举，暴雨疾风耳，智者不惧焉。

[译文] 一向简静沉默的人，爆发起来不可阻挡。因此滞留蓄积的水一决口不可抵挡，蛰伏动物的毒人们难以经受，潜伏的野兽凶猛起来不可禁止。轻易发出，骤然出现的东西，如同暴雨疾风一样，一会儿就会过去，有智慧的人不怕这些。

●平居无事之时，则丈夫不可绳以妇人之守也；及其临难守死，则当与贞女列妇比节。接人处众之际，则君子未尝示人以廉隅之迹也；及其任道徙义，则当与壮士健卒争勇。

[译文] 平居无事的时候，对大丈夫不可用妇人的操守来衡量；及其临难赴死时，则应当与贞女烈妇比节。接人处众之际，君子未尝显示出品德方正的行迹；及其任道徙义，则应当与壮士健卒争勇。

●明义理易，识时势难。明义理，腐儒可能；识时势，非通儒不能也。识时易，识势难。识时，见者可能；识势，非早见者不能也。识势而早图之，自不至于极重，何时之足忧？

[译文] 明白义理容易，识时势难。弄明义理，腐儒也能做到；识时势，非博通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不能做到。识时易，识势难。识时，看到的人就可做到；识势，非有预见的人不能做到。认清了势又能提早谋划，自然不会到极其严重的形势，还忧时做什么呢？

●只有无迹而生疑，再无有意而能掩者，可不畏哉！

[译文] 只有无迹生疑的人，没有心中有意而能掩饰的人，能不因畏惧而谨慎吗？

●令人可畏，未有不恶之者，恶生毁。令人可亲，未有不爱之者，爱生誉。

[译文] 令人害怕的人，没有不让人痛恨的，痛恨就会产生诽谤。让人可亲的人，没有不让人喜爱的，喜爱就会产生称赞。

●没这点真情，可惜了繁文侈费；有这点真情，何嫌于二簋一掬。

[译文] 如果没一点真情，有多少繁文侈费来招待也是白白浪费；如果有了真情，即使只有二碗饭一杯水也不嫌少。

●百代而下，百里而夕卜论人只是个耳边纸上，并迹而诬之，那能论心？呜呼！丈夫尚可轻论人乎哉？此天谴鬼责所系，慎之。

[译文] 百代以后，百里以外，评论人只是凭言语和文章，他的行迹也会被误解，还能评论到人的真实思想吗？啊！文士可以轻易地评论人吗？这是上天和鬼神都要谴责的事啊，一定要慎重。

●闭户于乡邻之斗，虽有解纷之智，息争之力，不为也，虽忍而不得谓之杨朱。忘家于怀襄之时，虽有室家之忧，骨肉之难，不顾也，虽劳而不得谓之墨翟。

[译文] 乡邻发生争斗，自己闭户不出，虽然有解决纠纷的智慧，有停止争斗的力量，但也不管不问。虽然有点狠心，也不能称作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的杨朱。为了解救洪水的灾难，虽然家庭遭到忧患，骨肉至亲发生危难，也不管不顾。这样的人即使再劳苦，也不能称作墨翟。

●流俗污世中真难做人，又跳脱不出，只是清而不激就好。

[译文] 流俗污世中真难做人，又跳不出去，只要做到自身清白，不再激起污泥浊水就好。

●恩莫到无以加处，情薄易厚，爱重成隙。

[译文] 恩情不要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情薄容易加厚，爱太重了就容易反而成仇。

●以至公之耳听至私之口，舜跖易名矣。以至公之心行至私之间，黜陟易法矣。故兼听则不蔽，精察则不眩，事可从容，不必急遽也。

[译文] 以大公无私之耳听那些私心很重的话，舜和跖名字就会颠倒。以太公无私之心走到那些私心很重的人中间，升降的标准就改变了。所以说兼听则不蔽，精察则不眩，事可以从容，就不必急遽。

●某居官厌无情者之多言，每裁抑之。盖无厌之欲，非分之求，若以温颜接之，彼恳乞无已，烦琐不休，非严拒则一日之应酬几何？及部署日看得人有不尽情，抑不使通，亦奉尽善。尝题二语于私署云：要说底尽着都说，我不嗔你；不该从未敢轻从，你休怪我。或曰：毕竟往日是。

[译文] 我居官的时候，讨厌那些虚伪不实的人的多言乱语，每每制止和抑制他们。对

那些无止的欲望，非分的要求，如果以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恳求不已，扰人不休，除非严厉地拒绝，否则一天的应酬何时休止？直到在部里做官的时候，才看到人家还有没有讲完的情况，如果不让他说完，觉得也不太好。曾经在私宅题写二句话：要说的尽着都说，我不嗔你；不该从未敢轻从，你休怪我。有人说：“还是以前做得对”。

●同途而遇，男避女，骑避步，轻避重，易避难，卑幼避尊长。

[译文] 同路相遇，男的要让女的先走，骑马的要让步行的先走，负担轻的要让负担重的先走，善行走的人要让行走不便的人先走，卑幼要让尊长先走。

●势之所极，理之所截，圣人不得而毫发也。故保辜以时刻分死生，名次以相鳞分得失。引绳之绝，堕瓦之碎，非必当断当敝之处，君子不必如此区区也。

[译文] 判断时势是否到了极点，事情是否合乎道理，圣人不能不在毫发之间斟酌。所以“保辜”这条法律，判断是算打伤人还算打死人，都规定了时限，而排列名次，相挨着的就分出了前后得失。至于牵引的绳子断了，掉下来的瓦碎了，不必弄清是在何处断的、碎的，对这类事情，君子不必区区计较。

●制礼法以垂万世绳天下者，须是时中之圣人斟酌天理人情之至而为之，一以立极，无一毫矫拂心，无一毫怨创心，无一毫一切心。严也而于人情不苦，宽也而于天则不乱，俾天下肯从而万世相安，故曰：“礼之用，和为贵。”“和”之一字，制礼法时，合下便有，岂不为关？《仪礼》不知是何人制作，有近于辽阔者，有近于迫隘者，有近于矫拂者，大率是个严苛繁细之圣人所为，胸中又带个怨创矫拂心而一切之。后世以为周公也，遂相沿而守之，毕竟不便于人情者，成了个万世虚车。是以繁密者激人躁心，而天下皆逃于阔大简直之中；严峻者激人畔心，而天下皆逃于逍遥放恣之地。甚之者乃所驱之也。此不可一二指。余读《礼》，盖心不安而口不敢道者不啻百余事也，而宋儒不察礼之情，又于节文上增一重锁钥，予小子何敢言？

[译文] 制定礼法，是为了能够流传万世，作为规范天下人行为的准则。制定礼法的人必须是立身行事都能合乎时宜、适合中道的圣人，斟酌天理人情的最细微处来确定，有一定的标准，无一毫纠正谁或拂逆谁的意思，无一毫惩罚谁或伤害谁的意思，又不一概而论。严格，但符合人情；宽容，但又不违背自然法则，使天下的人肯于遵从而万世相安，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和”这个字，制定礼法的时候，当时就有，岂不好吗？《仪礼》不知是什么人制定的，有接近辽阔的地方，有接近狭隘的地方，有接近纠正拂逆的地方，大概是个严苛繁细的圣人制定的，心中又有个惩罚、纠正的思想而一概而论。后世以为是周公制定的，遂相沿而遵守，毕竟不便于人情，成了个万世虚设的东西。因此说繁琐细密的东西激发人的躁心，天下人就都会逃到那些阔大简直的地方去；严苛峻刻的东西激发人的叛心，天下人就都会逃到那些逍遥放任的地方去。说的更严重点，简直是逼着人们叛离。《仪礼》中有这样问题的不只一二处。我读《礼》，内心不安而口不敢说的不只有百余事，而宋儒不察礼之情，又在礼节仪式上增加了一层锁钥，我作为后生小子，又怎么敢说呢？

幽梦影节选

——(清)张潮

●鳞虫中金鱼，羽虫中紫燕，可云物类神仙。正如东方曼倩避世金马门，人不得而害之。

[译文] 游曳于观赏池中的金鱼，栖身于房屋门楣间的紫燕，可以说是动物中的神仙。就象东方朔避世于朝廷之中，其他的人不能够危害他一样。

●楷书须如文人，草书须如名将，行书介乎二者之间，如羊叔子缓带轻裘，正是佳处。

[译文] 楷书写得要象文人那样风流倜傥、潇洒自如，草书写得要象名将那样气势如虹、指挥若定，行书则在二者之间，能象羊叔子那样以文人都督军事，却不披铠甲、轻裘缓带、

从容自在，才是最高境界。

●高语山林者，辄不善谈市朝事，审若此，则当并废史、汉诸书而不读矣。盖诸书所载者，皆古之市朝也。

[译文] 喜欢高谈阔论山林隐逸之事的人，就不屑于谈论市井朝廷的事。果真如此的话，就应当废弃《史记》《汉书》等史书不去读它了，因为这些书里所记载的，都是古代市井朝廷的事情。

●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

[译文] 对待自己应该带一点秋天的特色，冷静萧索，沉着稳重。待人处事应该带一点春天的风味，热情洋溢，生动明快。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译文] 一个人的胸中如果有一些愤愤不平的怨恨，喝下几杯烈酒后也许可以消除掉；但如果人间有特别不公平的事，那就非得靠利剑铲除。

●阅《水浒传》，至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几无憾耳。（如李太白有贵妃捧砚事，司马相如有文君当垆事，严于陵有足加帝腹事，王涣、王昌龄有旗亭画壁事，王子安有顺风过江作《滕王阁序》事之类。）

[译文] 阅读《水浒传》，看到快活林鲁达拳打镇关西，景阳冈武松醉打凶猛虎，真觉得痛快淋漓，因此想到在人的一生中，一定要做一件最令人感到痛快的事，才不会觉得白活了一场。即使不能做什么痛快的事，也要写出一本最为得意的著作，这样的一生也许可以说没有遗憾了。（象唐代诗人李白有杨贵妃为他写诗而捧砚的事；汉代司马相如有卓文君为他而私奔，为他而不惜当垆卖酒的事；东汉严光有与光武帝一同偃卧、足踏皇帝肚腹的事；唐代诗人王涣、王昌龄有旗亭画壁以论诗名高低的事；王勃探望父亲途中顺道在滕王阁上写出了名垂千古的《滕王阁序》，这样的事都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快意的事。）

●官声采于舆论，豪右之口与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花案定于成心，艳媚之评与寝陋之评，概恐失其实。黄九烟曰：先师有言：“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李若金曰：豪右而不讲分上，寒乞而不望推恩者，亦未尝无公论。倪永金曰：我谓众人唾骂者，其人必有可观。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古人之所贤也。贫而无骄，富而无谄，今人之所少也。足以知世风之降矣。许未庵曰：战国时已有贫贱骄人之说矣。张竹坡曰：有一人一时，而对此谄对彼骄者更难。

[译文] 一个人虽然贫穷但不卑躬屈膝地巴结讨好别人，虽然富有但不趾高气扬、骄奢淫逸，这是古代人所崇尚的。贫穷而没有不求于人的骨气，富有而缺乏谦恭待人的风范。这也是现代人不及古人之处。由此完全可以看出世风已经下降了。

●曰痴、曰愚、曰拙、曰狂，皆非好字面，而人每乐居之；曰奸，曰黠、曰强、曰佞，反是，而人每不乐居之，何也？

[译文] 说起来，像痴、愚、拙、狂，这些都不是什么好字眼，但人们常常以这些字眼为名为号，乐意以此自居；而奸、黠、强、佞这些都是好字眼，但人们都不乐意用这些字眼为名为号，这是为什么呢？

●若无诗酒，则山水为具文；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才子而美姿容，佳人而工著作，断不能永年者，匪独为造物之所忌，盖此种原不独为一时之宝，乃古今万世之宝，故不欲久留人世。以娶褻耳。郑破水曰：千古伤心，同声一哭。王司直曰：千古伤心者，读此可以不哭矣。

[译文] 如果没有诗歌美酒佐兴，那么天底下的山水都只是徒具形式的空文；如果没有美女佳人辉映，那么所谓鲜花，明月都只是形同虚设。富有文才的才子又生得英俊漂亮，美

丽妩媚的佳人又擅长吟诗作词，那他们肯定不能长寿，这不仅仅是他们被上天这个造物主妒忌的缘故，还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时一地的珍宝，而是古往今来、千秋万代的珍宝，所以他们不愿意太久地在人世间逗留，以免招惹轻侮褻读。

●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诗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玑锦绣誉之，则又何也？陈鹤山曰：犹之富贵家，张山曜野老落木荒村之画耳。江含徵曰：富人嫌其慳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绣也。张竹坡曰：不文虽富可鄙，能文虽穷可敬。陆云士曰：竹坡之言，是真公道说话。李若金曰：富人之可鄙者在吝，或不好史书，或畏交游。或趋炎热，或轻忽寒士，若非然者，则富翁大有裨益人处，何日少之？

吕氏乡约

——[宋]吕大忠

礼俗相交

●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渐去之。凡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当众议一法共行之。凡遇庆吊，每家只家长一人与同约者皆往，其书问亦如之。若家长有故，或与所庆吊者不相识，则其次者当之。所助之事，所遗之物，亦临时聚议，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数，若契分浅深不同，则各从其情之厚薄。凡遗物婚嫁及庆贺用弊、帛、羊、酒、蜡、雉、兔、果实之类，计所直多少。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丧葬始丧则用衣服或衣缎以为襚礼，以酒脯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则用钱帛为赙礼，用猪、羊、酒、蜡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五千，少至三四百。灾患如水火、盗贼、疾病、刑狱之类，助济者以钱帛、米谷、薪炭等物，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二三百。凡助事谓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则借助器用，丧葬则又借助人夫及为之营干。

患难相恤

●患难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诬枉，七曰贫乏。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若不及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皆有罚。凡事之急者，自遣人遍告同约，事之缓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遍告之。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

明礼让以厚风俗

●汉儒有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恒、随厥情欲，故谓之俗。其间淳漓厚薄，难以强同；奢俭质文，不能一致。是以圣人制为礼以齐之。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善礼为天地之经，万物之序，其体至大，其用至广。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尊卑贵贱，非礼不定；冠婚丧祭，非礼不备；郊庙燕饗，非礼不行。是知礼也者，风俗之原也。

然礼之用贵于和，礼之实存乎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平，何有。又曰：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使徒习平。繁文缛节而无实意以将之，则所谓礼者，适足以长其浮伪、滋其文饰矣。夫礼之节文，尔兵民或未尽习礼之实意。尔兵民皆所自具即当。事父母，则当孝养；事长上，则当恭顺。夫妇之有倡随，兄弟之有友爱，朋友之有信义，亲族之有款洽。此即尔心自有之礼让，不待外求而得者也。诚能和以处众，卑以自牧。在家庭而父子兄弟底于肃雍，在乡党而长幼老弱归于亲睦。毋犯器凌之戒，毋蹈纵恣之愆，毋肆一念之贪遂成攘夺，毋逞一时之忿致启纷争，毋因贫富异形有蔑视之意，毋见强弱异势起迫胁之心。各戒浇漓，共归长厚，则循于礼者无悖行，敦于让者无兢心。蔼然有思，秩然有义。党庠术序，相率为俊良，农工商贾，不失为醇朴。即韬铃介冑之士，亦被服乎。 《礼》、 《乐》、 《诗》、 《书》